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哲学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世界体系与现代性的局限

恩里克·迪塞尔

欧洲中心与全球体系，这两种对立的模式描绘出现代性问题的特点。前者从欧洲中心的视角，认为现代性现象完全是欧洲的，于中世纪发展勃兴，以后传播到全世界。^{〔1〕}韦伯用下面这个问题来解决“普遍历史的难题”：“在什么样的环境组合下，我们可以归结出这个事实，在西方文明里，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里，^{〔2〕}文化现象呈现为（像你们^{〔3〕}乐意认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4〕}根据这个模式，欧洲具有独特的内在特点，使它得以通过它的理性取代所有其他文化。在哲学方面，没人比黑格尔对现代性主题阐释得更精辟：“日尔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标是以自由——自由其本身的绝对形式就是其主旨——的无限自主来实现绝对真理。”^{〔5〕}对黑格尔来说，欧洲精神（日尔曼精神）是绝对真理，它无须借助他物，本身便能决定或实现自己。这个我称之为欧洲中心模式（与世界模式相对）的论断，不仅纠缠着欧洲和美国，还困扰着外围世界的整个知识阶层。这种设想的发展自有它的地缘政治。按照欧洲中心模式，从空间上来说，现代主体性的发展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直至法国的大革命。欧洲自始至终都是中心。将

历史‘貌似科学’地划分为古代(先驱),中世纪(预备期)和现代(欧洲)是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和变形的组织;就其他文化而言,它已引起了伦理问题。哲学,特别是伦理学,需要脱离这种简化论视角,以让其自身向“世界”、“全球”范围开放。

后一个模式,从全球视角出发,将现代性概念化为‘世界体系’^[6]的中心的文化,该体系也是包含美洲的最早的世界体系,^[7]同时也将其概念化为该“中心”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欧洲的现代性不是独立、自生、自指的系统,而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事实上,是它的中心。那么现代性便是全球性的。它开始于西班牙确立其‘边缘’的时候,(首先,正确地说,是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和秘鲁)。同时,欧洲(其历时性体现为它的前现代先驱: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和葡萄牙)统治着不断扩大的“边缘”(16世纪是美洲、巴西、非洲的奴隶供应海岸和波兰;^[8]17世纪是对拉丁美洲、北美、加勒比和东欧的巩固;^[9]19世纪前半叶是奥斯曼帝国、俄国、一些印度的王国、亚洲次大陆和首次深入非洲大陆^[10])逐步将其自身建立成中心(作为超级霸权从西班牙传给荷兰、英国和法国)。于是,现代性在这个全球模式中,是与‘中心-边缘’体系相合适的现象。现代性不是欧洲作为独立体系的现象,而是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现象。这个简单的假设完全改变了现代性的概念、起源、发展及当前的危机,而且,因此也改变了迟来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内容。

此外,我们还有个论点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不仅仅是在欧洲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而积淀的内部优势的产物,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归入)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这一简单事实赋予欧洲决定性的相对优势,得以超越奥斯曼-穆斯林世界、印

度和中国。现代性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的起因。随后，世界体系中心的运作让欧洲可以将其自身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历史的‘反思意识’（现代哲学）的东西，很多被当作它的独有产物的价值观、发现、发明、科技、政治制度等，其实是这个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中，古代中心向欧洲移位的结果（沿着时间轨迹，从文艺复兴到葡萄牙是先驱，然后到西班牙，后来到佛兰德，英国等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世界体系内欧洲的世界化和中心化这一情势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4,500年来在这个跨区域体系内人类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的经验现在被欧洲独霸，而欧洲过去从来都不是“中心”，最多也不过是个“边缘”。滑动是从中亚移向东部，意大利，地中海，更确切地说，是向热那亚、大西洋移动。以葡萄牙为先驱，面对中国试图从东方（太平洋）到达欧洲的不可能性，现代性在西班牙合情合理地开始了，它把美洲作为边缘纳入其中。让我们先看看论证的前提。

► 世界体系的扩张

由于奥斯曼-穆斯林的存在，我们将世界历史这一变动的开始定为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断裂和跨区域体系向最早的世界体系的转换。在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中，其高潮期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公元762年到1258年），而在最早的世界体系中，其中心直至今天都位于北大西洋。这种体系中心的变化有其历史背景：在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崩溃前，从13世纪到15世纪变化一直在进行。新的世界体系的第四阶段恰当地产生于1492年。在欧洲发生的一切事物仍是跨区域体系另一阶段的转折点。哪个国家推动了世界体系的展开呢？答案是将吞并美洲的国家，该国可以此作为跳板或“相对优势”，在15世纪末取得优势。候选的国家是中国、葡萄

牙和西班牙。

I

为什么不是中国？理由很简单。中国^[11]不可能发现美洲（这不是技术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而不是历史的或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能），因为它对于向欧洲扩展毫无兴趣。对中国来说，跨区域体系（在它的第三阶段）的中心是在东方，不在中亚就在印度。为什么要到完全属于“边缘”的欧洲去呢？这不会是中国对外商贸的目的。

事实上，在 1405 至 1433 年间，郑和七次成功地由海路到达体系的中心（他乘船航至斯里兰卡、印度，甚至还到了东部非洲^[12]）。1479 年，王钦（音译）试图取得与郑和一样的成功，但却未能达到他前任的航行记录功绩。中国自我封闭，而且不想去做此时葡萄牙正在从事的事情。它的内部政治局面——大约是官绅阶层与新兴的商业宦官之间的对抗^[13]——妨碍了它对外商贸的发展。但是，如果中国从事了航海冒险，它也要向西方去到达体系的中心。看起来，中国人曾向东航行，并到达了阿拉斯加，甚至远至加利福尼亚及其南部，但当他们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让中国商人感兴趣的东西，并且离开跨区域体系的中心更远时，他们极有可能放弃了这项艰巨的冒险计划。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中国不是西班牙。

可是，为了驳倒自韦伯以来就一再被强化的过时的“证据”，我们还是要问：在 15 世纪中国比欧洲文化落后吗？根据那些研究过该问题的学者，^[14]中国无论是在科技上，^[15]政治上，^[16]还是商业上，甚至在人道主义上^[17]，都不落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幻象。西方的科技史没能严格地考虑到，欧洲的“跃进”，科技的勃兴发生于 16 世纪，但直到 17 世

纪它才显示出多重效应。现代科技模式的形成（18世纪）和现代性的起源被混合在一起的，没有为中世纪模式的危机留下时间。科技革命——库恩所讨论的——产生于现代性。作为‘现代模式’^[18]的结果，现代性业已开始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5世纪（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来欧洲的发明）欧洲一点都不比中国先进。李约瑟被这个幻象蒙蔽，所以才写道：“事实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本土的发展，未能产生出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势均力敌的重大改变。”^[19]

将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20]视为一体和相同的事件（前者始于14世纪而后者始于17世纪）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所说的曲解。文艺复兴还是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中的、一种边缘文化的欧洲事件。科技革命是现代模式形成的结果，而现代模式需要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才得以成熟。皮埃尔·肖尼写道：“至15世纪末，在历史文献让我们理解的范围内，作为与地中海地区相比较的实体，至少在表面上，远东并没任何方面比欧亚大陆的远西落后。”

让我们重复一遍：为什么不是中国？因为中国发现自己在跨区域体系的最东区，由此，它寻找的中心是西方的印度。

II

为什么不是葡萄牙？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发现自己在相同的跨区域体系的最西点，因为它也在寻找，而且总是，向着中心，向着东方的印度。哥伦布的提议（试图从西方到达中心）对葡萄牙的国王来说，就像哥伦布宣称发现新大陆一样，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永远只是尝试，无法接受另一假设来到达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中心）。^[2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是跨区域体系的（边缘上的）最西点，在十字军东征于1291年失败之后，这些城市再次

将欧洲大陆与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十字军东征应被视为一次受挫的与体系的中心联系的企图，恢复被土耳其人割裂的与体系中心的联结。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热那亚（与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存在相抗衡），试图打开西地中海通道，至大西洋，以便通过南部非洲再次到达体系的中心。热那亚人将他们全部的航海经验和经济力量投入到为自己打开这条通道的事业中去。正是热那亚人在 1312 年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也正是他们在葡萄牙投资并帮助葡萄牙人发展他们的海上势力。

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因为欧洲人无法预见到俄国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扩张（俄国由北部的高寒林带前进，于 17 世纪到达太平洋地区和阿拉斯加^[22]），大西洋成了欧洲唯一通向体系中心的门户。作为欧洲第一个在 11 世纪已经统一的国家，葡萄牙将对穆斯林的再次征服^[23]转化为大西洋商业扩张进程的开始。1419 年，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1431 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1482 年发现了扎伊尔，而瓦斯科·达·伽马在 1498 年到达印度（跨区域体系的中心）。1415 年，葡萄牙占领了非洲穆斯林的休达港，1448 年占领了苏格堡，1471 年占领了阿齐拉。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意大利城市进行的跨区域体系联结的继续：“12 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开始出现在卡塔卢尼亚地区，13 世纪他们首次到达葡萄牙，这些都是意大利人为把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拉入当时的世界贸易，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到 1317 年，据弗吉尼亚·劳所云，‘里斯本的城市和港口或许是热那亚的贸易最大中心……’”^[24]

与伊斯兰世界接触，拥有无数水手（被从密集型农业中赶出来的农民），建立了货币经济，和意大利‘联系’密切，这样一个葡萄牙再一次为处于边缘的欧洲打开了通往跨区域体

系的道路。但是,除此之外,它仍然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葡萄牙人也无法自称已走出了这种局面,因为虽然葡萄牙业已试图控制阿拉伯海域(印度洋^[25])的商贸交换,但它绝没有办法生产东方的商品(丝织品、热带产品、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黄金等等)。换句话说,它是个中间人,而且永远是印度、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的边缘力量。

跟着葡萄牙我们进了前厅,但还没有进入现代性或是世界体系(体系第四阶段,该体系至少是从古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产生的)之中。

III

为什么西班牙开始了世界体系,并且随之开创了现代性?其原因正是那妨碍中国和葡萄牙的同一原因。因为西班牙无法到达位于中亚或印度的跨区域体系的中心,也无法由南大西洋(沿西非海岸,直到1487年发现布埃纳·埃斯佩兰萨站角)去东方(由于葡萄牙人业已先发制人,因此享有专权)。西班牙只剩下惟一的选择:横穿大西洋,从西半球,经由西面去中心,去印度。^[26]因此,西班牙偶然撞上了美洲,虽然是寻找但并未仔细探索,由此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模式便陷入危机(这是一种处于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最西点的边缘文化的模式),也因此缓慢但无法阻止地开始了第一次世界霸权。这是全球历史中惟一存在的世界体系,而且这是个现代体系,欧洲是它的中心,它的经济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者。

本文清楚地(也许是第一个试图如此‘清楚’的实用哲学体系)将自己置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观念中,不仅研究其中心(从笛卡儿到哈贝马斯,这一点已被现代哲学专门研究过了,也因此对历史上的民族事件持一种片面、偏狭的、地域性的观点),而且考察其边缘(并由此获得对人类经历的一种全

球性看法)。我的观点既非让人增长见闻,也没有什么趣闻轶事:它完全是哲学性质的。我业已在另一部作品中探讨过这一主题。^[27]在那部作品中,我说明了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那亚人,哥伦布不可能说服自己他所发现的不是印度。按他自己的想象,他已航行到接近小亚细亚第四半岛(在海因里希·哈默 1489 年于罗马绘制的地图中便已标明了^[28])海岸,当他横越过加勒比海时,已十分接近‘鸿沟’(古希腊人的大海湾,中国人的领海)。哥伦布于 1506 年去世,未能突破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29]秉承着由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 4,500 年的变革历史,他无法从主观上突破跨区域体系的视角,让自己接受世界体系的新阶段。第一个怀疑这是个新大陆(也是最后一个新大陆)的人是阿美利哥·韦斯普奇,所以从客观存在和主观意义上来说,在 1503 年,他是第一位现代人,也是第一个将亚-非-地中海地区拓展为世界体系,并首次将美洲包含在内的人。^[30]不仅从欧洲中心的视角,而且从世界模式的角度来看,在文化、科学、宗教、技术、政治、生态和经济领域内的这种世界观的革命是现代化的起源。在该世界体系中,中心的积累第一次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积累。^[31]在新的体系内,一切都在发生着本质而彻底地变化,而这中世纪欧洲边缘性的子系统也在发生着内部变化。奠基性的事件就是 1492 年发现美洲。^[32]西班牙准备好成为第一个现代国家;^[33]由这个发现,它开始成为第一个边缘(美洲)的中心,并由此安排老的中心,即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中心(13 世纪的巴格达)缓慢替换的开始。它从地处边缘的热那亚(仍属该体系的西部)重新联结的过程开始,起先是和葡萄牙,现在是与西班牙,确切地说是与塞维利亚联结。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的财富一下都涌向塞维利亚。于是,东部处于文艺复兴的地中海地区的(而且通过它,也联结了穆斯林世界印度的

甚至中国的)“经验”便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帝国相联结(该帝国势力影响至中欧的奥格斯堡地区、安布里斯的佛兰德地区,然后延伸至阿姆斯特丹,及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和米兰,特别是两西西里王国^[34]和南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地中海中无数的小岛)。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帝国的政治大业遭到经济上的失败,查理五世皇帝于1557年退位,为商业、工业、以及当今的跨国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留下敞开的通道。

让我们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取自许多可供分析的事物——我们不想因为我们所举的例子而被批评为简化论经济学家)来加以说明。1546年在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发现了银矿,正是由于最初运来的这些贵重金属,西班牙才能在帝国的多场战争中,装备起“无敌舰队”,于1571年在勒班陀打败土耳其人。25年后的这场胜利绝非巧合,从1503年到1660年间,共有18,000吨白银运至西班牙。^[35]这场胜利使得控制地中海作为与体系原来阶段中心的联系。不过,作为中心通往西部边缘的通道,地中海业已没有生命力,因为大西洋正在将自己建立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中心!^[36]

沃勒斯坦写道:“人们渴望得到作为贵重物品的金银,是为了在欧洲消费,更是为了与亚洲的贸易,而且那也是欧洲经济扩张的必需品。”^[37]在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档案大全》里未发表的书信中,我曾读到以下的文字,日期是1550年的7月1日,署名是玻利维亚的多明戈·德·桑托·托马斯:“四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的劫难行将终结之时,一个地狱^[38]之门被发现了,每年都有无数人牺牲在那里,被西班牙人的贪婪献祭给他们的神——黄金。^[39]这就是被命名为波托西的银矿。”^[40]其余皆都广为人知。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殖民地取代西班牙成为新建立的世界体系中心的霸权:它于1660年从西

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作为第一个现代港口，塞维利亚（与安布里斯一起）在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将它的地位让给阿姆斯特丹^[41]（这是笛卡儿于 1636 年写作《方法论》和斯宾诺莎将要生活的城市^[42]），一个控制着海军、渔业和行会势力的新港口，出口的农产品和各行业的高超技术都汇聚于此。在很多方面，这个城市将会使威尼斯走向没落。^[43]一个多世纪后，现代性已在这个城市业已定型的外貌中显现端倪：它的港口；作为商业通道可以通往中产阶级和商人家中的运河（他们将四楼和五楼用作窖室，用升降设备直接从那里把船放下来）；以及成千个其他一个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细节。^[44]从 1689 年开始，英格兰将挑战它的地位，并将最终强压过荷兰的霸权——不过，它还必须与法国分享这一霸权，至少到 1763 年为止。^[45]

与此同时，美洲构建着最初的现代性的基础结构。自 1492 年到 1500 年，大约有 50,000 平方公里土地被殖民化（在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从委内瑞拉到巴拿马的农场）。至 1515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300,000 平方公里，还统治着约 300 万美洲印地安人。至 1550 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已超过 200 万平方公里（面积比整个欧洲中心还要大），统治着超过 2,500 万（低估数）当地居民，^[46]其中很多人被纳入到为欧洲中心生产价值（在马克思的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系统中（在领地、苦役和大庄园中，等等）。我们还要加上从 1520 年开始自非洲而来的种植园奴隶（至 19 世纪奴隶制的最后阶段，共有大约 1,400 万人，包括那些在巴西、古巴和美国的奴隶）。与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相比，这一巨大的空间和人口将给欧洲、世界体系的中心以相对的、确定的优势。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 16 世纪“边缘（东欧和拉丁美洲）使用强制劳动力（[美洲的]奴隶制和强制性的商业作物种植劳力）。而在中心，正如

我们将看到的,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劳动力。”^[47]

根据这一哲学著作的目标,必须特别指出,随着世界体系的诞生,“边缘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边缘结构的形式最终将同时依赖于积淀的前资本主义结构的性质和外部侵略的形式。”^[48] 这些就是 20 世纪末拉丁美洲的边缘结构,^[49] 以及非洲班图人、穆斯林世界、印度、东南亚^[50] 和中国的边缘结构;还得加上社会主义解体之前的东欧。

► 作为全球中心“运作”的现代性和它当前的危机

于是我们便触及了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现代性是第一个世界体系中心“管理”的产物。我们现在必须要深思这意味着什么。

至少有两种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西班牙式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性质的现代性,仍然与老的地中海、穆斯林和天主教的跨区域体系相联系。^[51] 在这种现代性中,新体系的“管理”是在跨区域体系的旧有模式之外构建的。也就是,通过一种一体化的文化、单一语言和单一宗教的霸权,西班牙将欧洲“管理”成对世界控制的中心(因此,美洲印第安人将遭受基督教教化过程),以及作为军事占领、官僚政治组织、经济征收、人口迁徙(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将永远定居在美洲)、生态变更(通过改变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等等的中心。这就是世界帝国计划的实质,正如沃勒斯坦写道的,它和查理五世一起失败了。^[52] 第二种是随佛兰德的阿姆斯特丹兴起而开始的盎格鲁-日耳曼欧洲的现代性,常常被认为是惟一的现代性(这是松巴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解释,甚至连后现代主义者也如此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制造了一个“简单化的谬误”以阻断现代性的意义并由此阻断其当前的危机感)。为了要控制巨大的世界体系,而这个世界体系是忽然对渺小

的荷兰^[53]——从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而变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敞开其自身，这第二种现代性必须通过简单化来实现或提高其效力。它必须进行抽象化（以量来弥补质的损害）以剔除很多正确的变量（文化的、人类学的、伦理的、政治的、宗教的变量对 16 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有价值的方面）。这些变量会阻挡对世界体系进行合理的“真实的”^[54]或是技术上可行的管理。^[55]这一对复杂性的简单化^[56]包含着全部生活世界、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目的论的一种新的技术与生态立场）、主体自身（对主体一种新的自我理解）以及公众群体（一种新的主体间相互关系和政治关系）。一种新的经济态度（生产实践的）现在将自我建立起来 它就是资本主义。

第一种西班牙式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提供了对最高意义的理论和哲学反思，这恰是为所谓的现代哲学（是第二种现代性的仅有的哲学）所忽略的。16 世纪的理论-哲学思想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它首先也是惟一地经历了第一个世界体系的建立，并将这一原初经历加以表述。因此，除了原有的理论（援助 7 经院-穆斯林-天主教和文艺复兴的哲学），已获得的中心的哲学伦理问题如下：欧洲有什么权利去占领、统治和管理新发现的文化？这些文化是用军队征服并加以殖民化的。自 17 世纪起，第二种现代性的良心不再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它已经被解决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和巴黎（包括 17 世纪以及从 18 世纪以来），不再有人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毫无疑问，这种超级意识形态建立起其对世界体系统治的合法性）。直到 20 世纪末，与其他运动一起，自由哲学才再次对它提出疑问。

在另一部著作中我曾提及这个伦理问题。^[57]这里我只概括地阐述一下其主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他大量的作品中运用极其丰富的书籍资料，在此基础上理性而谨慎

地论证指出，作为世界体系的建构，欧洲并没有权利在美洲扩张（先于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这是不公正的暴力行为，不可能具有伦理上的合法性：

那些自称为天主教徒的西班牙人，通常主要是以不义、残忍而血腥的战争，去毁灭那些可怜的民族并将他们从地球上抹去。然后，当西班牙人屠杀完所有为生存或无法忍受的苦难而战斗的当地人时，也就是说，当他们屠杀完所有的当地统治者和年轻人时（因为西班牙人一般只放过妇女和儿童。这些妇女、儿童遭受着人类乃至牲畜所承受过的最艰难、最痛苦的奴役），他们把一切幸存者都变成奴隶……他们之所以屠杀残害多得难以计数的人，是因为这些天主教徒的最终目的是获取黄金，在短时期内暴富，并由此上升到与他们的功德不相称的高级阶层。应该记住的是，他们那世界第一等的永不满足的贪欲和野心，就是他们恶行的原因。^[58]

后来，哲学不再明确表述这一难题。在世界体系建立的初始，它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自由伦理学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极其重要的。

16 世纪，世界体系在塞维利亚建立，而哲学问题，从旧有的哲学模式和习惯控制中解脱出来，但还没有形成新的模式。但是，这种新模式的起源不应与现代性的起源混淆起来。在该模式形成，用库恩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与其自身的新体验相契合的一个多世纪之前，现代性便已于 1492 年开始。这种新的现代模式的形成发生在 17 世纪的前半叶。^[59] 这个新模式与扩展中的庞大世界体系的、效用的迫切需要、技术上的‘现

实可能性”及管理上的政府至上主义是相称的。通过对生活世界和子系统(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的“合理化”，它体现出简单化的必然的过程。由维尔纳·松巴特、恩斯特·特鲁尔奇和马克斯·韦伯^[60]建立的合理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但是，对理性化管理世界体系进行简单化，其结果可能比哈贝马斯或后现代主义者想象得还要深刻而消极。^[61]

有形的穆斯林-中世纪主体被简单化了：主体被假定为一个自我，一个我，就此笛卡儿写道：“相应地这个‘我’——也就是，我之所以为我的灵魂——是完全与躯体不同的，事实上它比躯体更容易了解，而且即使躯体不存在，它也不会消失改变。”^[62] 躯体只是一部机器，是外在事物，完全与灵魂不同。^[63] 康德自己写道：“人的灵魂应被视作在现实生活中同时连接着两个世界：在这些世界中，当它和躯体形成个体的人时，它只感受到物质的世界；相反，作为精神世界的一分子[没有躯体]它接受和传播精神本质的抽象影响。”^[64] 这种二元论——鉴于普遍真理不应有任何经验主义的或是“病理学的”动机，康德将之用于他的伦理学——随后由对实践智慧的否定表达出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处理技艺、技术上的“运作”(面对几何性更强的智慧，伦理学消失了)的工具理性取代了实践智慧。正是在这里保守传统(如海德格尔的)继续感知到对生活的有机复杂性的简单化抑制，现在被“权利意志”(尼采和福柯阐释的论述)这一手段所取代。带着对伟大发现的天真热情，伽利略写道：“哲学被写入这部天书之中，这个宇宙，一直都让我们凝视。但这部书却无法读懂，除非你首先通晓写作这部书的语言和会读这些字母。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字符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对它一个字也不可能理解；没有这些，你只是在

黑暗的迷宫中彷徨。”〔65〕

海德格尔说过人要有‘数学地位’；你在接触本质前便必须具备数学知识；‘上手可用’（例如科学公理），接触本质只是为了运用他们。比如说，你不是‘学’武器，相反，你只是学怎么‘用’它，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数学是这样一些事物：在对他们的认知范围内，我们业已预先了解他们，身体像身体，植物像植物，动物像动物，事情像事情，等等。’〔66〕对政治生活（官僚机构化）、资本主义企业（行政管理）和日常生活（卡尔文派的苦行主义或清教主义）的‘合理化’；主体的非物质化（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带来对活劳动的异化影响，并且如弗洛伊德分析的，对它的欲望也有异化影响），每一种经济或政治构成的非伦理性（只作为技术工程来理解，等等），现在被工具理性所代替的对实践—交往理性的抑制，否定群体的唯我论的个体，等等，都是实例，揭示出这一简单化所抹煞的多种多样的契机。欧洲发现它自身需要长久地将对世界体系的中心的管理保持下去，而简单化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二元论（没有限定物质性）等等都是与欧洲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相一致的该功能运作的结果：结果是通过体系的调节建立的，而体系最终使他们成为整体。作为剥削与积累的调和（世界体系的结果），资本主义后来演变成一个独立体系。该体系的自指和自生逻辑可以摧毁欧洲及其边缘，甚至整个地球。而这是韦伯觉察到的，但却是简化的理解。换句话说，韦伯注意到现象的一部分但没有留意到世界体系的范围。事实上，使世界体系可运作的简单化的形式过程，产生了形式合理化的子系统，该系统后来在其自身现代性的局限中并没有自我调整的内在准则，使其可以重新指向为人性服务。正是在此时，中心里出现了对现代性自身的批判（也来自边缘，如我的）。现在人们（从尼采到海德格尔，